

三十年来的台湾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赵碧玉

回顾台湾的高等教育，三十年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 1950年以前；
2. 1950—1965年，美军美援来到台湾，崇洋风气盛行，高等教育数量大发展，从升学主义到留学主义；
3. 1965年以后，台湾外贸和经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从重数理转向工商，专科发展很快，要求发展科研。

1950年以前

日本占据时期，台湾的中学教育相当普及，高校却只有4所，即台北帝国大学（日本帝大分校）、台北经济专校、台中农林专校及台南工业专校。光复接收后分别改为国立台湾大学、省立法商学院（旋即并入台大法学院）、省立农学院（后扩大为中央大学）、省立工学院（后扩大为成功大学）。因为日据时期，这几所高校的教员几乎全是日本人，光复后的师资问题十分严重。除了将极少数日籍专科技术人员留任，或由本地选拔若干外，不能不从大陆各省聘请教师。当时内地正在复员，也十分需要人材，因而所能罗致的也很有限。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有些高校教师也跟着落脚台湾，使高校师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在这段期间，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喘息未定，高等教育根本不受重视。即使后来局面初定，高教的目标也只在于安定人心，谈不上任何发展。

1950年至1965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继而有大批美援随美军涌入台湾。这种形势一方面暂时消除了台湾当局朝不保夕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它在经济上有可能挪出经费来办教育。高等院校和学生数量

开始急速上升。高等院校总数由1950年的7所（4所大学或独立学院，其余为专科学校）增至1965年的56所（其中35所为专科学校），学生人数也在15年间增加5倍（见附表）。由于高教经费、师资和设备的种种限制，大多数院校的质量日趋降低。所幸还有一个联合招考（简称“联考”）制度，把住高等院校的门，多少保障了学生的最低水准。一般说来，要混毕业不难，要挤进门去却不大容易。

联合招考与升学主义

这个联合招考可以说是台湾高教的一大特色。自1954年开始施行，二十多年来已形成了一种制度。联考对学生和各校行政主管都十分便利，也是一种较公平的录取方式。二十多年来除了蒋介石的孙子和极少数的权贵子女曾走后门入学外，新生录取并不受权威与金钱的直接干预。若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联考制度有它的缺点，如一般中学里的“升学主义”泛滥，联考录取率高的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好中学，各中学也竟以提高录取率为目标，愈来愈忽略教育应当兼顾“德智体群”的平衡发展。由于联考方式固定，内容历年大同小异，大多数中学生在面临竞争激烈的联考之下，都以备考作为学习的指导方针。青少年主动求知的精神和创造发明的能力都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学生们一进高中就开始准备，到考试前几天，学生和家长都抱着如临大敌的心情去背水一战，考取则有前途，考不取则沉沦底层，这是台湾社会的不幸。许多学生虽考进了好大学，却对读书求学丧失了兴趣。在大学生身上普遍存在中学时期形成的备考式的求学习惯，大学成绩优良的学生也常常没有显出任何特殊的创造力。各高校由于缺少自行挑选新生的权力，丧失了各校原有的特色。此外，高等院校学生普遍体质差，近视眼占极大比例，这也是联考制度的流弊。

私人兴学

这段期间另一个明显的特色是私立高校从无到有,增至32所(其中包括20所专科学校,见附表)。台北当局教育经费有限;而又要适应社会上升学主义的压力,因此鼓励私人兴学。然而现代高校(尤其是科技教育)所费不菲,私人财力毕竟不足。大多数私校因此都偏重文法商科,有些人办学的目的是营利,使许多私立院校的师资设备多年不得改善。

这时期的另一特色是高等院校的女生人数剧增(见附表),因为文法商学科招生名额大增,一般中学女生备考及记忆能力比男生强,而且一般中学女生比男生用功,较保守而肯服从讲义,肯于和善于背书,容易适应测验式的考试。升学主义的社会压力也构成多数中学女生投考大学的一个强烈动机。大学文凭逐渐变成一种无形嫁粧。知识本身的价值,或者知识可以贡献于社会的功用,就不太被考虑了。

留学主义

升学主义进一步演化为留学主义,是这个时期台湾高校最重要的特色。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都以出国留学作为优先选择的道路。大学理工科毕业生中学业成绩较好者,几乎全在毕业后三、五年内远赴异

国。去时或因迫于社会压力,或志在进修,结果绝大多数都演成壮士一去不复返的结局,在薪酬高、工作环境好的外国定居下来。社会上却往往给这些人以过高的评价。文法科学学生受到同样的压力,明知国外谋生并不理想,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往外冲。对于充斥在文法学院里的女生来说,出国还有寻求更理想对象的一层涵义。这种留学风气有其政治背景。台湾当局在许多政策上和高级官员的作风上有意无意地鼓励了社会上的崇洋心理。对许多知识青年来说,面临的是一个标榜民主,事实却并无民主法治的社会,所学非社会所需,甚至根本无业可就。在失望愤懑之余,乃有远走高飞之念。当局一再开放並鼓励留学,实际上是有宣泄和减轻社会问题的功用。二十多年来的留学政策造成几万留学生在外国(主要在美国)滞留不归*。著名大学(如台湾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均步入此途。各式各样人才如此大规模的“楚才晋用”,使高等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沦落到为外国培育人才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不算一件奇事。

然而一窝风留学风气形成之后,就更助长社会上崇洋之风,小学生“立志”要做留洋博士的多了起来;教育的理想或者高等教育原有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台湾高等教育的部分统计数字(1950—1975)

类 别	区 分	学 年 度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公、私立高等院校 (包括①大学 与独立学院②专 科学校)	校 数		7	15	27	56	92	101
	学 生 人 数		6,665	18,174	35,060	85,346	203,473	289,435
	每万人口中的学生人数		8.67	20.2	32.5	67.58	145	179.2
	女 生 人 数 占 全 部 学 生 的 比 例 (%)		10.9	15.2	23.4	31.2	38.5	36.8
大学与独立学院	校 数		4	10	15	21	22	25
	学 生 人 数		5,379	13,629	27,172	55,812	95,145	140,630
	每万人口中的学生人数		7	15.1	25.2	44.2	68	87
	女 生 人 数 占 全 部 学 生 的 比 例 (%)		12.0	16.5	20.6	26.8	35.3	35.8
专 科 学 校	校 数		3	5	12	35	70	76
	学 生 人 数		1,286	4,545	7,888	29,534	108,328	148,805
	每万人口中的学生人数		1.67	5.1	7.3	23.38	77	92.2
	女 生 人 数 占 全 部 学 生 的 比 例 (%)		6.1	9.1	36.4	40.1	51.6	37.7
私 立 高 校	私 立 大 学 与 独 立 学 院 校 数		0	4	7	12	12	12
	私立占总校数比例(%)		0	40	46.6	57.1	50	48
	私 立 专 科 学 校 校 数		0	1	6	20	50	56
	私立占总校数比例(%)		0	20	50	57.1	71.4	73.7
	私立高校学生总人数		0	2,447	9,461	43,019	128,939	190,440
	私立高校学生人数 占 学 生 总 数 (%)		0	36.7	26.99	50.41	63.37	65.8
学生对教师人数 比例	私 立 高 校		——	19.27	17.52	21.98	26.66	28.86
	公 立 高 校		6.91	10.33	9.81	11.55	13.45	14.13
研 究 所	设有研究所的高校数目		1	3	7	10	10	18
	研 究 所 总 数		3	13	35	59	104	159
	研 究 生 人 数		5	169	437	993	2,295	3,912

据台湾行政院1978年的材料,自1953年至1977年,由台湾赴美留学的约45,000人,留学后回台工作的约4,500人,占十分之一。



图1 一群大学毕业生

1965年以后的经济发展

1965年前后,有三件事标志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首先是1963年在全年总生产中,工业部分(主要是轻工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农业部分。其次是美国不堪越战消耗,停止对台湾经援(军援仍继续),台湾地少人多,必须自谋经济出路,逐步日本外销的先例,开始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要发展方向。第三是大陆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使台湾当局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所受的压力大为减轻。其后10余年间,经济发展加速,加工出口业顺利推进,台湾当局累积了外汇,有余力推动多项大规模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工业的发展。

如今回顾台湾那些年大力拓展外销的做法十分成功。出口金额由1963年的2.4亿美元增至1972年的31亿美元,10年间增加12倍。1973年西方控制的金融制度崩溃,世界粮食减产以及石油危机相继发生,使世界贸易额锐降。台湾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太高,首当其冲,物价暴涨,并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时人心惶惶。台湾当局因累积了大批外汇,临危不乱,同时推动多项大规模建设,在百业凋敝之际,以增加公共投资的方式来刺激有效需求。5年以来,度过难关,又部分恢复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贸易是台湾表现最出色的一面。1978年出口金额127亿美元,在全世界名列第18位。美国是第一大贸易国,而台湾在美国的贸易对手之中,名列第7。有此成就,确实不易。

从数理转向工商

这段时期的高等教育也反映了这些经济发展的情况。50—60年代,台湾高等院校的数理科系一直比工商科系吃香。50年代杨振宁、李政道在国际物理界的成就更大大地激发了年轻学子献身物理的热潮。各大学物理系一直保持在联考录取分数的前几名。这种情况直到60年代末期随着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开始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工程科系和商学院的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科系。工程科系在联考的报名表上名列前茅,而商学院系反在工学院之上。台湾大学国际贸易系录取分数最高,系主任常与人开玩笑说,如果他来考,也落榜无疑。事实上,确有一些一流的理工科大学生,

毕业后再考入商学院或国际贸易系深造。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当局在各院校增设工商科系和研究所亦不遗余力,师资设备都有所改善。同时扩充专科以培养较实用的人才。从附表可以看出,1965年以后的10年间,专科学学生增加到5倍。以工科而论,尤为突出,1965—1974年10年间,大学工科学生只增加到2.5倍,而专科则为16.6倍。所谓“十大建设”吸收了部分高等院校工程科系的毕业生,加工企业与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商学院科系毕业生的出路。留学风潮虽没有下降的趋势,但不再被视为高等院校毕业生谋生的唯一途径。相对于工商科系的发展,文学与社会学科成为大冷门。一般负有较大谋生责任的男生干脆不投考文科学院。以台湾大学文学院为例,10余年来女生常占全院学生十之八九,可说是一种畸形发展。

就业问题

台湾高校在数量上的增加固然培养了大批的毕业生,对台湾经济的急速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近几年高等院校每年有毕业生6万多人,继续进修(在台湾或出国)的不到10%,其余的都要就业。1977年曾有过一项全面的调查统计,发现毕业后迄未就业者达36.4%。由于调查信函的回收率仅约40%(24,000余人答复),最乐观的算法是假定未寄回调查信的人均已有职业;即使如此,失业者亦达全部毕业生的15%左右,可以说相当高了。学非所用或屈意就业的还不包括在内。这种供过于求的现象,台湾当局近年已渐重视,开始缩减各院校的招生人数。从台湾最近所发表有关经济建设机构人力需求量的估计来看,未来数年间,高等院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现象仍不会改观。

科技教育水平

更迫切的问题是高教的质量,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教育。台湾高等院校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为谋生计,许多教师身兼数职,很难专心教学,更谈不上做研究工作。久而久之,教学内容更新改良都成问题。1953年起,教育当局设有高等院校教师“学术研究补助费”,金额少,也不要求研究成果,结果只成为变相的生活津贴。为提高师资水平,1965年以后,为了储备工业化所需人才,扩充了研究所,从附表可以看出,此后10年,研究所学生人数增加至4倍。1968年台湾教育部与其他单位洽商,决定设置研究教授与副教授300名,给以优厚待遇,使他们能专心研究及教学。后来受到社会人士反对,改为遴选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鼓励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回台服务。在此以前,也曾邀请不少“海外学人”回去短期讲学,收效极微。原因是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台湾差距很大,专家学者所具备的专业科技知识对台湾的需要未必适时。短期讲学的人为了省力,常常也只是现货热卖,很少针对各院校的需求提供服务。报章杂志一方面为官方政策捧场,一方面迎合社会风气,大事渲染一些“海外学人”,使得社会上崇洋之风比前更甚。

不过,也有些青年客座教授经过这种过渡以后,长期留了下来。另一个措施是选拔年轻科技人员(包括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攻读高等学位。

学位制

1965年以后,岛内各院校研究所大为扩充。师资较充实的大学也开设了数理工程方面的博士班。在台湾施行的学位制度主要是依据美国大学的模式。学生的素质和评审水平并不逊于科学先进的国家。理工科硕士班在台已有20年历史,历来的毕业生除部分留台做教学或就业于工商界外,大多数仍以出国为最终目标。博士班历史较短,毕业人数有限,成效尚不明显。社会上崇洋之风在学位制度上亦有所反映。台湾毕业的被称为“土硕士”或“土博士”,在待遇上常低于“洋博士”。虽然后者的学识水平和对社会的贡献常常不如前者。对客座教授与各院校原任教授待遇之差别更为显著,造成许多原有心回台服务者宁可身在海外,偶作蜻蜓点水似的回台讲学;长期在台者的积极性因而深受打击,有能力者最终仍远走他乡。

文法与社会科学教育

文法社会学科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比理工科更为严重。对中国过去有所认识、在学术上较有造诣的老教师人数极少,年事亦高。年轻一代教师有幸在相当安定的环境中成长,本应有出色的表现,事实却不然。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国民党对异己文史学者的迫害造成严重恶果,一些肯于附会当局的文抄公却被誉为“史学家”。当局对近代史资料实行相当彻底的封锁,致使广大群众包括大专学生对近代中国日渐生疏。前几年当局居然将大批不对自己史学界开放的“文献资料”特别开放给几个日本人,写出一本《蒋介石秘录》,当局还大加吹捧,译为中文,贻笑大方。在经济方面,由于台湾的急速繁荣,相对地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对提高,于是教授们到处兼课者有之,拼命乱写文章者有之,甚至经营各种副业者亦有之。被损害的就是教学与研究的品质了。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位的则变成少数。这些少数的年轻学者的优点是比较能掌握较新颖的、西方近年发展的某些方法学,处理人文社会现象有若干深入之处,因此也曾有些目光犀利、掷地有声的专业作品。然而,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和在欧美留学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意无意地比较容易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少数人甚至流为洋奴心态。这样,对文法科高教的质的影响亦为不利。

然而,台湾当局对于文法科高教仍有所改革。那就是从1971年起,各院校的法律系一律改为5年制。这虽然无助于减除司法黑暗或改进立法程序,但却是针对日益工业化的台湾社会,和愈趋复杂的人事关系作出的努力。

吸引留学生回台政策

近年台湾当局吸引留学生回台服务的做法值得一

提。1971年,台湾官方的“青年辅导委员会”开始正式办理“辅导”留学生回台服务。一方面替各高等院校物色师资,另方面也替公私机关和工商企业求才。到1978年底,已吸收了4,000多留学生回台就业。其中有博士学位者占四分之一,有硕士学位者占五分之一。这4,000多人中,部分是军事院校派出进修的军职科技人员,受规章约束,必须回去。也有部分回台后对工作不满,再行离台。即使如此,比起五、六十年代离台后一去不返的留学生,对台湾简直弃之如鄙履,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改变。

留学生回台的原因很多。台湾的物质条件比起20年前,确有很大进步,高校教师或其他适合留学生的职位,大都可衣食无缺,温饱有余;科研环境在近10年来也有所改善。例如大小电子计算机在高教与科研单位里已经普遍使用,海外文献不难搜集,“国科会”对科研计划的评审和经费的分配大致能做到公平合理。社会上的政治气氛亦有变化,国民党当局在近年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冲击之下,不能不稍稍收敛一下过去的极权统治,对思想政治犯的处理,比起50年代算是开明多了。这使一些爱护乡土,对社会抱有使命感的留学生,减少了一些离心离德的倾向。近10年来,台湾工商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也提供了许多留学生可以发挥一技之长的机会。

留学生回台服务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的影响是明显的。首先是他们给高等院校带来了活力与朝气,科研与教学的风气大有改善。据抽样统计,公立院校数理科系的教师约半数每年均有一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在海内外期刊上发表。抱一本陈年讲义混饭吃的教师已逐渐被淘汰。许多院系的负责人都年在40以下,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改革上也较能力行。这些年轻教师属权贵子弟者毕竟是少数,思想上也接近新生的较开明的社会力量。高等教育与社会新生力量间的相互影响,是台湾社会未来发展值得重视的一环。

经济展望

尽管1978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超过历年(官方发表数字为12.8%),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未来几年的任务特别艰巨。这可以分别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来说明。

轻工业出口是台湾多年来赚取外汇的主力。而今劳工工资提高,廉价劳动力不再足以作为竞争海外市场的有效手段。资源较台丰富、劳力更低廉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纷纷拟以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追上来。亦有人公开指出,如大陆亦转向真正重视贸易,不出三五年,台湾、新加坡与南朝鲜的一半市场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台湾工业的制造能力与技术水平都有相当提高,但要真正工业升级,追上10年前的日本,仍然大大不及。尤其是近10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崛起的南朝鲜,各方面已与台湾不相上下。能源危机之后,双方都因为缺乏能源且依赖出口,不得不重新检讨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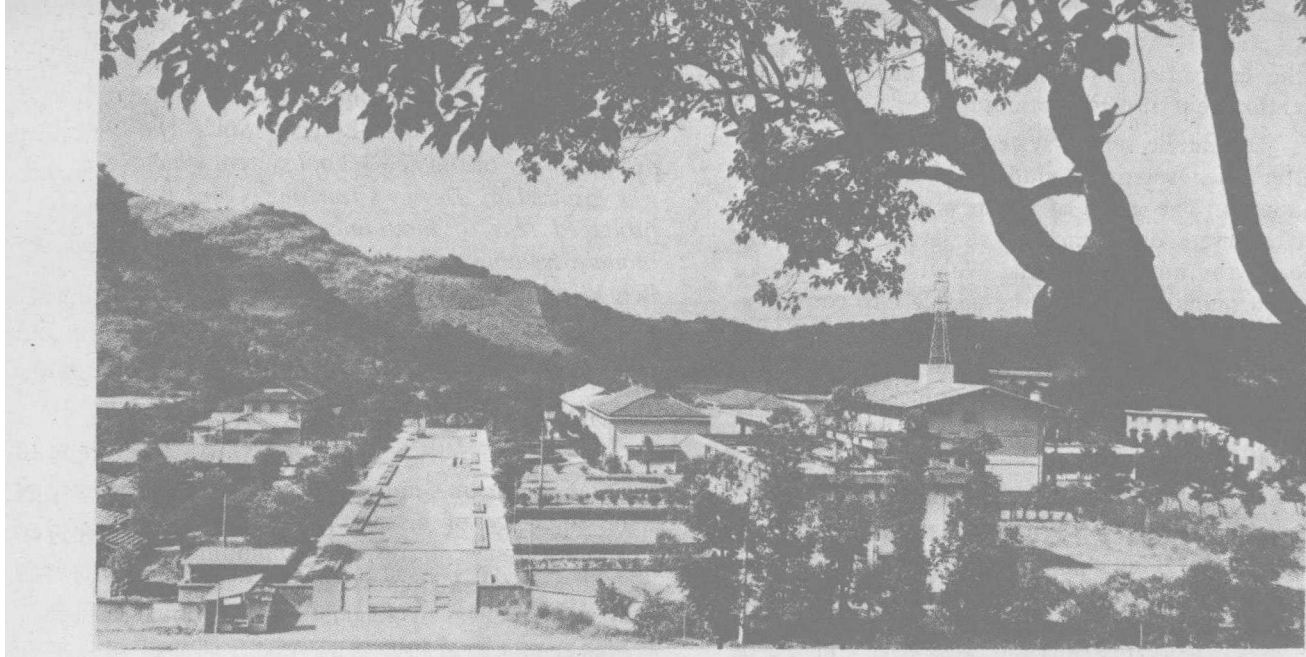


图2 南港一研究院

来经济发展的策略。双方不约而同，定下了大致相似的“战略产业”。可是南朝鲜的劳力数量与资源都比台湾充沛，规划的规模也比台湾大得多，可谓未来几年台湾对外贸易上第一大敌。所谓战略产业，相对于双方原有的劳力密集产业，指的当然是资本密集（即需要大量资金的）产业（如重工业与石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即需要高级技术的）产业（如精密工业与电子工业）。前者台湾的条件不如南朝鲜。但在平均生活与教育水准方面，台湾则领先，因此技术密集工业才是台湾可望求胜的主要方面。问题是技术密集工业在建立初期可以从先进国家购买整套技术与机器，但若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性，则非建立、掌握并随时改进自己的技术不可。因此，高教（尤其是工程与企业管理部分）的质量攸关，不容轻忽。

农业方面亦有类似的问题。直至六十年代初，台湾农业利用美援，在技术上得以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很多，间接为轻工业发展奠定有利基础。近10年则大体上停滞不前。甚至由于工业发达吸引了农村劳力，产生了部分弃农现象。台湾的节育计划不十分成功（人口由30年前的800万增至今日的近1,800万），因此早年增加的单位面积生产逐渐被人口增加所抵消。台湾的经济学家也已指出，如果农业技术上不再有所突破，不但轻工业的一部分原料基础不稳，三、五年后，甚至粮食自足也不可能；一但有事更不堪想象。其他如农产品加工外销的产业，面对各农业国日益强劲的竞争，也只有加强技术改进，才可能保持原有市场。

高教展望

经济学家早已发现，教育可以看做人力上的投资，不论是个人所得或社会的繁荣，大体上都随人们所受教育或社会教育发达的程度而增加。台湾近10余年经

济的高速发展，也反映在劳动力所受教育逐渐升高的数字上。

另外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高教在台湾的政策中，早年只扮演一个敷衍凑数的角色，近年则已渐渐变成人力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配合经济发展，有它一定的任务。至于规划的方向，大体上是量的收缩——尤其是在与经济生产较少直接关联的学校或院系——与质的提高。

我国的传统，比较偏向于灌输式的教育，不鼓励寻找疑问和独立思考。至于台湾的高教，一方面限于师资与经费，大半采用大班制；另一方面亦囿于传统官场防弊的心理，有所谓“部定”的学制、课程与教材。结果学生的必修课很多而选修课很少，教师要开新课亦不大容易实现。比起欧美许多大学生近二、三十年来种种实验创新，台湾的高教不能不说太缺乏弹性。

台湾高教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在其他方面就配合不上。例如都市的繁荣已不限于都市，从文化上来说，大部分乡镇也都市化了。本土文化急剧沉沦——地方戏、皮影戏、捏糖人的手艺都行将失传；而新的城市化的大众文化，在整个商业化的压力之下，常常诉诸感官反应而流于低级趣味。有识之士也都在慨叹“精致文化”的丧失。同时几所大家公认较好的（也就是联考录取分数较高的）大学，却一直无法设立艺术系、音乐系与戏剧或影剧系。无怪乎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大部分只爱看外国电影。再如台湾的文学院不少，然而比较扎实的工作如文学理论专业、科技史专业、艺术史专业、宗教史专业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除了培养配合科技发展的人才之外，建立精致文化和培植人文艺术，并进而改变社会风气，也应成为台湾高教的目标。

三十年来的台湾的高等教育

(见正文62页)



台湾大学



辅仁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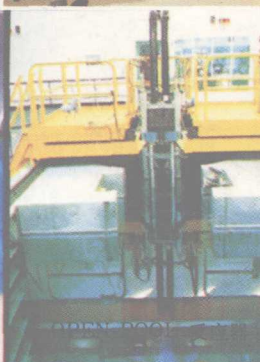
新竹清华大学校门



华冈中国文化学院



图书馆



活动中心



移动式数学反应器



梅贻琦纪念堂